

清代经学诗学理论建构研究

——以《诗经》学、音韵学、音乐学为中心

刘玉洁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淮北

收稿日期：2026年5月12日；录用日期：2026年6月8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17日

摘要

本研究以清代“经学诗学”为研究对象，聚焦其通过《诗经》学、音韵学、音乐学三大领域沟通经学与诗学的独特路径。研究深入解读《诗经》学、音韵学、乐律领域文献及诗学文本，揭示清代学者如何在经学框架内进行诗学理论建设。研究表明，清代经学诗学不仅具有集成性和创新性，而且形成了以经学为本位、实践与诗学阐释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为理解清代诗学的主流形态提供了关键视角，凸显了其在中国诗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经学诗学，《诗经》，音韵学，音乐学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Dynasty's Theory of Classical Studies and Poetics

—Centering on the Studies of *The Book of Songs*, Phonology and Musicology

Yujie Liu

School of Literature,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Received: May 12, 2026; accepted: June 8, 2026; published: June 17,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classical studies and poetics” in the Qing Dynasty as its research object,

文章引用：刘玉洁. 清代经学诗学理论建构研究[J]. 国学, 2026, 14(3): 882-889.

DOI: 10.12677/cnc.2026.143124

focusing on the unique path through which it connected Confucian classics and poetics via the three major fields of *The Book of Songs* studies, phonology, and musicology. The research delves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 and poetics texts in these three fields, revealing how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 constructed poetics theor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classical studies and poetics in the Qing Dynasty not only possesses integrative and innovative features but also has developed a model that is centered 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deeply integrates practice with poetics interpretation. This provides a key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mainstream form of poetic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highlights its indispensable and significant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ics.

Keywords

Classical Studies and Poetics, *The Book of Songs*, Phonology, Music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绪论

发轫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诗学思想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之一，初以孔子为代表，其发展与演变始终与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经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代学术以“复盛”的经学与繁荣的诗学著称于世，在两者交融互渗的领域孕育出极具时代特色与理论深度的成果。黄金灿在《清代“经学诗学”研究的对象、热点与前景》一文中，敏锐地提出并系统阐释了“经学诗学”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与儒家经典、经典解释学及其理论相关的诗学”，是诗学的一个分支门类[1]。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为理解清代诗学的主流形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更揭示了一条贯穿中国诗学思想史的重要线索。

在经学复盛与诗学繁荣的双重背景下，清人在中国经学诗学史“末端”的环境中，结合时代思潮和学术方法，赋予了经学诗学新的内涵。“经学诗学”的概念本身具有跨学科色彩，无论是指含有诗学意蕴的经学问题，还是指带有经学意蕴的诗学问题，其重心都会归结到诗学。而在经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清代言坛中，与之密切关联的“经学诗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主流诗学的价值取向，此为理解清代文化政策与审美风尚不可或缺的维度。黄金灿在文章中指出，《诗经》学、音韵学、音乐学是沟通经学与诗学的“三座重要桥梁”。这三者不仅构成了经学诗学的核心内容，也在清代学术体系中展现出互为影响的紧密关系。这种多维度的学术融合，不仅拓展了诗学的理论体系，也强化了经学在清代文学批评中的主导性作用。

然而，目前学界对清代经学诗学的研究，虽然在具体个案上成果丰硕，但缺乏以“经学诗学”为明确理论的系统性研究，许多宝贵的诗学思想散见于浩如烟海的经学注疏、小学著作以及文集笔记之中，亟待系统发掘与整合。因此，本研究以黄金灿提出的“经学诗学”概念为理论基础，聚集其指明的清代经学诗学最具特色与潜力的三大领域——《诗经》学、音韵学、音乐学，旨在深化理论认识，丰富并深化对“经学诗学”内涵的理解，突出清代在《诗经》学、音韵学、音乐学方面的卓越成就，阐明这些成就如何成为其经学诗学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显著标志与独特贡献。

2. 清代经学诗学发展的背景与脉络

清代复杂而矛盾的政治文化生态为经学诗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使其在繁盛的同时呈现出独

特的风貌。有清一代，一方面文字狱的思想钳制迫使学者转向远离现实政治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又标榜“崇儒重道”，推崇程朱理学为正统，组织编纂大型文化工程，营造“稽古右文”之象。裹挟之中，学者们被驱入经史考证与文献整理的领域，由此考据学兴盛，进而成为清代经学的核心方法，同时亦深刻渗入经学诗学之中。

明清之际，经学出现了求是致用的倾向。“本朝学术盖尝三四变矣。开国之初，人才皆明代之遗，议论志趣，略尚文辞，又好言经世，只为几、复两社余波……经学亦滥觞于明之遗老，绵延授受，至此大昌。然向之浮夸庸陋，余习渐染，亦未能天下从风，或且因以求胜。至于学矜西汉，书高宋槧，水火之争，因兹以起。则于不变之中而变之机已伏，是在学子之能自得师矣。”^[2]晚清学者谭献认为清初学术承晚明之风，经世之热切与辞章之追求皆与明末有密切联系，甚至浮夸炫耀之气亦有沿袭。而乾嘉经学经过学风的几次转折之后，“一变而为疏谬，再变而为琐屑，三变而始为经学”，以博雅为尚的风气影响了一代人，如文坛大家惠栋，早年间的杂学之趣到中晚年转向治经之道，成为汉学一代宗师，其学术发展亦是乾嘉时期学风演变的缩影。在清廷文化政策引导和自身逻辑发展下，以惠栋、段玉裁、王念孙等为代表的考据学在乾嘉年间达到鼎盛，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核心，主张通过严密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制度考据，探求儒家经典的本义。至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阶级矛盾的日益激烈，人们开始对儒家经典产生疑问，如胡渭著《易图明辨》指出《易图》为五代道士陈抟伪造，杂入《易经》，这种能在思想界产生巨大震动的发现启迪了时人的疑古与求是精神。敢于突破古说，实事求是，不信古且疑古，是清代汉学家的治经之法。梁启超曾言：“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3]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考据方法进而成为清代经学诗学最鲜明的时代印记。

乾嘉汉学的兴盛，引发了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与反思，形成“汉宋之争”，而此争论亦是清学史上的大关节，涉及清末民初学人对清学史的建构与书写。汉学注重字词训释，斥宋学空疏臆断；宋学沿程朱一派，则贬汉学繁琐难读。二者争论之张力在诗学领域亦有呈现，有清一代诗学在重视心性之学的基础上反对“空谈心性”，以明心见性、提高道德修养作为经世致用的必要素质和条件，由此出发，性情、学问、世运的观点一直贯穿清代诗学思想始终，清初诗论家主张性情与学问融合，这种思想影响了整个有清一代的诗学，如标榜“神韵”的王士禛并不废学问，亦有“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的言论^[4]。汉宋之争与调和的尝试亦在清代诗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道咸以降，社会危机深重，主张“变易”“改制”、服务于社会改革的今文经学呈复兴姿态，以常州学派为主，晚清今文经学家强调经世和关注现实，学术方面也转向注重阐发义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晚清诗学的发展。如魏源《诗古微》中体现的解诗方法，结合历史变迁和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从根源和现实着手，有其独到之处，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魏源通经致用的创作准则，以及自身封建纲常传统的影响，使《诗》的解说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政治、伦理、道德的说教色彩。如将《召南·摽有梅》解读为“嫁取失其盛时之年，习乱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时也”，为其强加“圣人之化”^[5]，正是今文经学影响下《诗经》学与诗学互动的典型。

清代经学诗学的思想成果主要凝结在各类文献载体之中。作为经学研究的自然延伸，清代学者在研治《诗经》《礼记·乐记》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对诗歌本质、表现手法、诗乐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其论述直接构成“经学领域的诗学问题”，清代诗论家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或进行批评实践时，常将经学思想援引其中，或运用经学考据方法来论证诗学观点。在考《诗》古音时，顾炎武就表明他的初衷是：“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6]故《诗本音》是以证古音、明经义，进而

明道救世。援引考辨、疏证究竟的考据之风在诗学领域亦有颇丰成果。在清代经学诗学的主要文献类型中，经学注疏类为核心载体，尤以《诗经》学著为最，清代研究《诗经》的著述数量较为丰富，宁宇在《清代诗经学》一书中有所统计：《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记载了 370 部《诗经》著述，《清代诗经著述现存版本目录初稿》中记载了 794 种清代《诗经》著作，可见清代《诗经》研究文献数量之多^[7]；小学与乐律类著作承担着经学与诗学沟通桥梁的作用，通过考证《诗经》韵文以及先秦汉唐的乐律传统，服务于经义阐释的同时，将“诗乐一体”理论与时代观念嵌合，是经学诗学中不可或缺的音乐维度。经学诗学融合的显性表达则体现在清代诗话、文论类著作，如叶燮《原诗》、袁枚《随园诗话》等，虽属专门诗学，但其理论建构深受经学思想浸润，是“带经学色彩诗学”的集中体现。

清代经学诗学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与激荡的学术思潮中孕育、发展并走向繁荣，虽然有清一代的学术关注重心与研究方法有阶段性差异，但经学与诗学的深度交融从未消沉。这种交融在《诗经》学、音韵学、音乐学三大领域表现最为集中，三座桥梁，构成了清代经学诗学的基本框架。

3. 清代《诗经》学中的诗学问题

《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兼中国文学之祖，其独特的双重属性使其天然成为经学与诗学交汇和核心场域。清代新汉学逐渐兴起，学者论《诗》往往汉宋兼采，将汉学训诂与宋学义理融在一起，于经学中求致用。在乾嘉时期考据学蔚为主流的风气下，独具特色的清代《诗经》新汉学应运而生。而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与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清廷统治摇摇欲坠，考据学一味泥古的考证已不适应内外交困的社会局面，经世之学蓬勃发展，《诗经》今文学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迅速复兴。在清代汗牛充栋的经学阐释著作中，经学研究方法与诗学思想的融合呈现出独特张力，而这些诗学思想的发展亦与清时复杂的治学环境息息相关。

《诗经》自汉代便被尊为经典，清代学者对其“经”的神圣性和“诗”的文学性始终保持高度自觉，大多诗学问题也都试图在经学的框架下处理。“诗经清学”之“复古考据之风渐起”，从治经方法出发，对于绝大多数清代学者而言，《诗经》首先且根本上是儒家经典，承载着伦理教化的“圣人之意”，通经致用之风尚使其诗学阐释从属于经义阐发。例如魏源解诗时受伦理纲常观念影响而产生的一些错误观念，将“诗言志”之“志”，首先落脚于政教善恶与美刺之心，诗学在此便成为治经的辅助工具。尽管有清一代经学立场占主导地位，但《诗经》自身的文学特质是无法被掩盖的。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影响了学者在治《诗》时的严谨态度，而在考据过程中，必然直面其情感抒发、意象营造、语言艺术等诗性特征，治《诗》方法呈现多元化倾向。此现象始于明末，始自明中期的《诗经》文学化倾向至明末时依然存在，其摒弃了以往的经学观点，以文学的视角解读《诗经》^[8]。尽管以诗解《诗》的观点在清人学者看来属于末流，并不以为意，曾国藩甚至有言：“章句者，古人治经之盛业也，而今专以施之时文；圈点者，科场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以施之古书。末流之迁变，何可胜道？”^[9]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诗经》的文学阐释倾向依旧延至清代，这种文学性阐释虽常包裹在经学外衣之下，却构成了清代《诗经》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为后世“性情”、“兴观群怨”之探讨提供了溯源线索。明末治《诗》的多元化态势发展到清初已有明显转向，即随着理学的没落与实学的兴起，《诗经》学的阐释路径已较多地集中为汉学考据派。以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考据新风，冲破宋明理学的藩篱，进一步树立治经方法在诗学领域的标杆作用。如王夫之著《诗经叶韵辨》考证诗韵，文章以对《诗》叶韵的批驳和对《诗》古音的研究为主，纠“叶音”之误，使世人明白《诗经》古音。

从清代治经大家的著作中我们可窥经学阐释中诗学观念的析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是乾嘉汉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之一，其以广阔的视角来进行《诗经》研究，不仅集录了《诗经》研究的典范著作，对清人的考据方法及成果也多有借鉴，博采众长而独释新意。《毛诗传笺通释》紧握考据学的研究

方法,广泛征引各代治《诗》经典,从经、史、子、集各部文献中寻求例证,试图还原《诗》之原义。正如《自序》中所说:“志存译圣,翼兼综乎诸家;论戒凿空,希折衷于当至。”[10]严谨的治学态度使该书在通假、训诂等语言学方面成就卓然,然而在其经学考辨之下,常流露出对诗篇情感的细腻把握,体现出一种通过考据求真以达诗情之真的诗学倾向。马瑞辰对《诗经》的文学性研究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在阐释诗篇大义时,他能深刻把握比兴等文学艺术手法,使考据服务于情感理解。马氏善于通过文字训诂、古音通假等手段,扫除理解障碍的同时,更真切地体会诗篇情感。例如解释《唐风·葛生》“葛生蒙楚,葳蔓于野”,马氏注意到了葛藤相缠的比兴之意;关于《秦风·权舆》,郭注引《诗》为“胡不承权舆”。马氏推测郭璞所见毛《诗》版本增加了一个“胡”字。他探讨增加“胡”字的好处是使“词义更婉”[11]。关联全诗情感脉络,给予《诗经》文学层面的审美关照和情感品评。考据在此有了深入诗境的桥梁。其次是“情性”的自然流露。在考证研究的同时,马氏注意到了《诗经》的情境创造、作者创作意图以及诗中人物的情感心绪,他在阐释中亦常强调诗歌是“情性”的自然流露。比如,《邶风·静女》“侯我于城隅”,马氏云:“诗人盖设为与女相约之词。”训释《唐风·绸缪》“见此邂逅”,马氏云:“此诗设为旁观见人嫁娶之辞。”[11]抓住抒情要点,呈现诗篇画面,论证情感发生的真实性及其表现的合理性。将《小雅·四月》等怨刺诗通过考证历史背景注入合理的情感需求,而非简单的“怨诽之乱”。在经学“温柔敦厚”的框架内,为诗学中真情实感的文学性表达争取了书写空间。

魏源的《诗古微》是清代今文经学派《诗经》学的典范。他想重新确立三家《诗》的地位,严厉批评毛《传》郑《笺》,其根本目的在于“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即通过《诗经》阐释来干预现实政治。《诗古微》中有明显的尊王思想倾向,较为突出的是他对“迹熄《诗》亡”的解读。《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12]魏源反对赵歧所注的《春秋》应世道衰微而生的观点,认为世道衰微不代表“颂声不作”,根据他的考证,将“《诗》亡”与“王者之迹”联系起来,王室衰微但仍有权威,至平王末年,天子黜陟赏罚之权尽失,太师陈诗观风制度尽废,王者之迹荡然无存。诸侯放恣,天下无主,于是素王孔子修《春秋》以存文王之德、周公之礼。可见魏源的尊王意识是非常强烈的。魏源的《诗古微》将《诗经》的诗学能向社会批判和政治讽谏倾斜,展现了一种功利主义的诗学观。作为今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魏源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准则,注重经学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功用,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5]。虽在考据上常被诟病主观武断,但其强烈的经世精神和对诗歌社会功能的强调,构成了晚清经学诗学中独特而重要的一环。

作为经学诗学枢轴的清代《诗经》学,虽以经学为依归,其过程与成果却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典诗学。不仅展现了考据学方法与诗学理解的复杂关系,更凸显了经学立场下诗学阐释的多样性,经学的权威性与诗学的深刻性融合,组成了清代经学诗学最丰富的部分。

4. 清代音韵学著作中的经学诗学意蕴

音韵学在清代学术中熠熠生辉。它不仅是考据学家“通经”的核心工具,更因其研究对象直指《诗经》《楚辞》等韵文文本而天然地与诗学紧密相连。清代音韵学的勃兴,首要动力源于经学阐释的内在需求。自宋明以来,《诗经》的押韵问题因古今音变而显得晦涩难通,朱熹“叶音说”虽为弥缝,实属臆测,严重阻碍了对《诗经》文本乃至其他上古韵文的理解。顾炎武是清代古音韵学研究的开创者,他所著《音论》集中展示了顾炎武关于古音学的十五个重大问题的见解,并将其放在《音学五书》之首——“此书为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论何也?曰审音学之原流也。”[13]《音学五书》被誉为清代古音学的“开山之作”,主体上包括《音论卷》《诗本音卷》《易音卷》《唐韵正卷》《古音表》五部分。其中包含两个重要理论:一是“古诗无叶音理论”,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音变,彻底否定了“叶音说”;二是“入声理论”,首创以阴声韵配入声韵的理论,建立了上古音韵研究的入声系统,开创了古音研究的新

局面[14]。与此同时，顾氏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证明了《诗经》自有其严密的古音系统。顾炎武还提出“有定之四声以同天下之文，无定之四声以协天下之律”的理论，“无定之四声”适用于诗歌韵律，《诗经》《离骚》等诗歌韵文常用于歌咏，可以改变某字的读音进行押韵。这不仅是音韵学的成就，更是经学阐释学的一次解放，使得学者能够依据古音，更准确地理解《诗经》的文句与章法，为其文学性的感受提供了可靠基础。此后，经过江永《古韵标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戴震《声类表》乃至江有诰《音学十书》等学者的不断深化与精细化，上古音系得以空前清晰地重建。这一学术进程，始终围绕着《诗经》用韵的阐释展开，服务于《诗经》的文本解读。因此，清代音韵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经学的音韵学”，逐步夯实了经学研究的基础。

清代的古音研究的影响已深刻渗透到诗学理论的建构之中。首先是对古体诗声律论的重构。唐宋以降，近体诗格律严明，而古体诗的用韵与声调则相对自由而缺乏明确规则。清代古音学的成就，为学者们从理论上重构古体诗的声律规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术依据。他们主张，古体诗应上溯先秦两汉的古音系统，以求其“古雅”之味。王士禛《古诗平仄论》与赵执信《声调谱》的问世，对于古诗声调学的独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虽然主要关注点仍在平仄交替的声调模式，而非韵部，但开启了从音韵角度研究古诗法度的风气。此后，古诗声调学得以广泛传播，成为学诗者之津梁，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古诗声调学研究的行列中来。亦有学者尝试将古韵分部的知识应用于创作实践，主张古体诗押韵应依据古韵相通之例，避免出韵。这使古体诗的创作从一种模糊的模仿，转向一种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自觉的声律追求。其次在诗歌本源的探索方面，江有诰的《诗经韵读》是清代音韵学研究的顶峰之作之一，该书逐篇标注《诗经》各章的韵脚字所属古韵部，并时常论及韵例和章法。且江氏在《诗经》音韵考证时“合韵”处理得大于失，是对段玉裁“合韵”说的继承和发展，剔除了段说不合理的内涵，而给予更科学、更简洁的解释，使“合韵”说更具说服力，对古音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15]。与此同时，它最直观地揭示了《诗经》作为中国诗歌源头所具有的音乐性、节奏感和形式美，使后世诗人能清晰地感知古诗的韵律奥秘，亦强化了《诗经》作为诗歌艺术最高典范的地位。

清代音韵学以其辉煌的成果成为经学诗学丰富的研究素材，完美诠释了它作为经学与诗学之桥梁的角色。以“通经致用”的实用目的为始，通过对《诗经》用韵精密的实证研究，不仅极大推进了经学阐释的深度与准确性，同时在诗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果：即重构古体诗声律的理论。与此同时，清代音韵学揭示了《诗经》作为诗歌本源的艺术奥秘，亦强化了其典范意义。清代诗学所呈现出浓厚的学理化倾向，是音韵学在清代学术体系中精密化表达的具化。至此，经学通过音韵之已深入诗学领域。

5. 清代音乐学著述中的经学诗学观念

“诗乐一体”的观念自古有之，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清代之经学复兴与乐律学的研究紧密相关，清代学者对乐律学的深入研究构成了清代经学复兴的组成部分之一。清儒对上古乐制的考证，复古为表象，其深层意图在于通过重建“乐”的规范，来追寻儒家“诗教”与“乐教”的理想，进而深刻影响了对诗歌本质、功能及其音乐价值的理解。“礼乐”制度是儒家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核心象征，例如，《礼记·乐记》作为儒家乐论经典，其阐释离不开对古代乐律的基本理解。因此，研究乐律，直接服务于对《乐记》等经学文本的解读。同时，明清学者围绕《诗经》的音乐性以及诗乐关系产生许多知识性话语，他们普遍承认《诗经》的乐歌性质，又难以突破诗经汉学的屏障，依旧重视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有清一代，经学层面的诗乐关系大致趋于稳固，以诗统乐的教化理路占据了主流。古乐失传、乐教衰败的情况下，文字义理言说具有教化作用与现实意义，显示了以诗统乐思想的合理性[16]。然而清初诸儒如毛奇龄，其乐律研究仍带有明显的经世色彩。他们相信，考定乐律、复兴古乐，有助于教化人心、移风易俗，乃至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种将乐律之学与经世理想相联系的传统，为理解诗歌的社会功能提

供了深厚的理论背景。

清代的乐律学研究著作，其论述常自然而然地延伸至诗学领域。凌廷堪的《燕乐考原》是清代乐律学研究的一座高峰。其核心贡献在于考证了隋唐至宋代的燕乐二十八调系统，澄清了千余年来对燕乐调名的混淆，为词体“倚声”之学提供科学依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有总论，有后论，於二十八调各有条辨，复为燕乐表以明之。”^[17]词是“诗乐结合”的后期典范，自明代以来，词乐失传，词沦为纯文本创作。凌氏通过对燕乐调的精密考证，使学者们能够从乐律角度理解不同词牌的声情差异及其来源。这极大地深化了对于词体作为一种音乐文学的本质认识。凌廷堪的研究从音乐本源上揭示了这些文本格律何以如此，将词学从“文字律”向“音律”推进了一大步。

陈澧的《声律通考》是另一部集成之作，旨在通考古今声律的变迁。他在《声律通考》卷九中写道：“余于凌次仲，实资其先路之导，其精要之说，固已采录之，至其持论偏宕，则不可不辩，其纷纭舛错，读之而不可解者，尤不能不为订正，九原可作，当以为诤友焉。”由此看来，陈澧《声律通考》实为匡《燕乐考原》之谬而著^[18]。陈澧的音乐观有明显的尊古意识，如陈澧在第一卷中以《周礼》《礼记》为古乐的发端，第二卷中以《管子》《吕氏春秋》为最古。他对古代乐制的考证，最终是为了印证和捍卫儒家“诗乐相将”的理想范式。这种观念深深影响了其对诗歌价值的判断：最具价值的诗歌，是那些能够与乐配合、用于教化人心的作品。陈澧运用其深厚的乐律学识，对《诗经》的音乐性进行了更具实践性的探讨。这使得《诗经》作为经学元典和诗歌总集的双重属性，在其乐律研究中得到了某种与音乐的统一。

清代乐律学研究渗透并影响了当时的诗学观念。学者们对古代乐制的考证，不断提醒着人们诗歌与音乐同源这一事实。这使得“音乐性”被视为诗歌不可或缺的内在属性。无论是探讨《诗经》韵律，还是词体的“倚声”，都促使诗学家们超越单纯的文字意义，去关注诗歌的声调、节奏、旋律感等内在音乐美。乐律是音乐领域的“格律”，具有严谨的乐理形式。清儒对乐律的极致追求，体现了一种对形式美的追求和规范性的崇敬。这种精神气质与同期诗学中对诗法、格律、学问的重视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清代文学重视法度的时代风气。

清代的音乐学研究，体现了清儒在整体经学复兴运动中针对“乐”这一方向的专注和努力。学者们通过考证燕乐、词乐等，证实了音乐文学中词体不可剥夺的本质属性，词学研究的深度得到进一步深化，而在坚守“诗乐合一”的儒家文化理想的同时，音乐学的词学深入与诗学中的格律追求相互映照，体现了清代诗学的学术化倾向。通过《诗经》学、音韵学、音乐学的相互架构与连接，清代经学为诗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深度和历史维度，共同塑造了清代经学诗学厚重笃实的学术面貌。

6. 总结

本研究以黄金灿提出的“经学诗学”概念为理论框架，聚焦清代这一中国经学与诗学均达致鼎盛的特殊时期，深入考察了《诗经》学、音韵学、音乐学三大关键领域如何具体地充当沟通经学与诗学的桥梁。清代经学诗学是一个脉络清晰、内涵丰富的学术体系。它并非“经学”与“诗学”的简单概念叠加，而是在清代特定学术环境中，经学以其强大的思想权威和独特的研究方法，深度渗透诗学理论所形成的独特知识领域。

三大领域共同构筑了清代经学诗学的核心并互相联通。《诗经》学作为最核心的领域，体现了经学元典与诗歌总集的双重属性如何在其阐释中被调和与统一，极大地丰富了对诗歌本质与功能的理解。音韵学以其空前精密的古音研究成果，重构了古体诗的声律规范，并为诗歌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工具。音乐学则从儒家礼乐理想的制度层面，追寻“诗乐合一”的古老传统，体现了诗歌与音乐同源的传统。

综上所述，通过聚焦《诗经》学、音韵学、音乐学三大领域，可知“经学诗学”在清代的繁荣之势及

其独特价值。在清代诗学领域，学者们通过这座独特的桥梁将经学的厚重兼深度注入其中，创造出一种兼具学术严谨性与艺术实践性的诗学形态。这不仅是中国古典诗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也为后世思考文学与学术、形式与义理之间的关系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

参考文献

- [1] 黄金灿. 清代“经学诗学”研究的对象、热点与前景[J]. 社会科学动态, 2024(5): 82-86.
- [2] 刘奕. 清代中期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 2007.
- [3]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4] 萧华荣. 中国诗学思想史[M]. 第1版.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5] 魏欣. 魏源《诗古微》诗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保定: 河北大学, 2013.
- [6] (清)顾炎武. 音学五书·答李子德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7] 盖明浩. 《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中所涉《诗经·周南》文献整理与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沈阳师范大学, 2024.
- [8] 卢玮玮. 顾炎武《诗经》学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9] (清)刘声木, 刘笃龄. 菴楚斋五笔·论评点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10] (清)马瑞辰, 陈金生. 毛诗传笺通释·自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1] (清)马瑞辰, 陈金生. 毛诗传笺通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2] 郑玄, 孔颖达.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13] 高天霞. 顾炎武《音论》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0.
- [14] 范春光. 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卷》中的入声理论[J].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21, 24(1): 121-124.
- [15] 曹强. 江有诰《诗经韵读》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9.
- [16] 杜昀静. 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教化理路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太原: 山西大学, 2024.
- [17] 鲍恒. 凌廷堪《燕乐考原》与词乐研究[J]. 徽学, 2002(2): 1-16.
- [18] 李自浩. 浅析陈澧《声律通考》要旨[J]. 中国音乐学, 2007(4): 14-17.